

社会学家茶座

主编 张立升 执行主编 王焱 | 总第三十九辑 2011年第2辑

Teahouse for Sociologists

廖 奕
陆学艺、孙立平、郭于华等
肖 瑛
郝 建
王学泰
李向平

“后商君时代”的法家文艺
聚焦：社会的重建
社会学的为何与何为
那颗卖了七亿票房的子弹打中了谁的胸膛？
江湖人的梦（之一）
毛泽东信仰的经济学分析



山东人民出版社

说“社会”

近代文史大师章太炎、陈寅恪、繆钺等都称美宋代，认为那是华夏文明的巅峰。然而根据为何，他们却语焉不详。

1925年，正当大革命的狂飙席卷南中国的时候，当时青年都热衷于谈论如何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却鲜有人关心如何保卫社会、如何构建社会。老辈史学家柳诒征先生却别具只眼，他在《学衡》杂志第五十四期上发表了《述社》一文，追溯华夏历史上的社会存在及其意义，可谓别有深意，迄今依然值得一读。

柳先生知道“专制之政，利民之散而不聚”。但他考求《礼记》等先秦典籍，却发现“求之史策，‘社’之一字，已含有团体组织之意”。或许是因为去古未远，那时的“社”还保有氏族民主的遗风：“周制，祭社则读法，考其民之德行道艺，盖以祀社而寓选举之法。”迄于宋代，更有了“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的历史记载（《宋史·程颢传》）。这或许是汉语中“社会”一语的最早出处。柳文认为，日本人正是由此取材，用以译西文society一语。society在西文中固然有其复杂的脉络，但柳先生却不认为这是近代取自异域的一个外来概念，而认为是中国历史传统中固有的实体。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社会”概念，既不包括古代社会的家族组织，不属于私人领域，也不包括那些以商业为目的而聚集的社团。他说：“吾国人自家族组织、国家组织之外，别有一种团体之组织，其始由于宗教，继则相与娱乐，又进而为学术文艺政治之集合，亘古迄今，相沿不改。”在他看来，那“亘古迄今”的社会，具有前政治的生命和统一性，因此反而是政治结构所必须为之服务的。“夫人，生而有群，禁其群之集合，无以宣泄其情。必有溃决横溢之患。”在这一点上，其实是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他进而钩稽沉隐，揭示宋代社会中早已存在的文士社、士、巡社等等自发性社团组织，认为“社会之发达，元明之际，文人学者集合社会，多本于宋”。

从社会理论的视角看，政治系统不过是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之一。假如政治子系统过度膨胀，不仅会戕丧社会的生机，造成国民的矮化，而且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晚近日本大地震的衍生灾难，就大可作为“政府失灵”的一个例证。

为何近代文史大师都盛称宋代？柳文拈出的“社会之发达”，大概可以作为答案之一。马克思不曾指出，自由就在于将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吗！



目 录

卷首语 | FOREWORD

001 王 焱 说“社会”

随 笔 | ESSAYS

004 高 政 自我为什么是深渊？

010 廖 奕 “后商君时代”的法家文艺

013 苏熠慧 底层群体的失语与发声

017 陈蓉霞 “中性化”现象之我见

021 罗牧原 王冰洁 以学习为志业

聚 焦 | PERSPECTIVES

社会的重建

026 陆学艺 中国进入社会建设的新阶段(上)

034 郭于华 克服“社会恐惧症”

041 孙立平 我们面临的抉择：重建权力，还是重建社会？

048 程新友 社会学视野下的“灰社会”

学术圈 | ACADEMICAL CIRCLES

052 张天潘 “中国”：从被围观到被消费的华丽符号

060 薛 涌 为什么美国不是个榜样？(上)(走出美国主义之二)

073 吴万伟编译 必须遏止泡沫学术的泛滥

社 会 | SOCIETY

077 翟一达 消费革命中的人们

086 王建民 社会分化——从结构到心态

088 陈占江 “吉登斯悖论”的中国逻辑

095 王学泰 江湖人的梦(上篇)

社会思想 | SOCIAL THOUGHT

102 肖 瑛 社会学的为何与何为

110 李宏图 人的个性与多样性的社会(下)——密尔对现代社会的思考

世 相 | MASSES

118 李向平 毛泽东信仰的经济学分析

122 谭志云 中国慈善传统的断裂

阅 读 | READING

125 郝 建 那颗卖了7亿票房的子弹打中了谁的胸膛?

133 王澄霞 雄性荷尔蒙过盛作怪耶?

文 化 | CULTURE

140 李 石 以艺术的形式思考政治

148 韦明铤 陈素素(扬州美女杂写之四)

资 讯 | INFORMATION

◇中国经济位居全球第二至少还需要50年◇中国改革前景取决于去苏联化程度

◇中国最像德国◇良知资本主义前景美好◇阿拉伯国家面对民主◇科学家把思想

植入猴脑◇神曲《忐忑》:音乐如何被解构成后现代的碎片◇陆兴华:当代艺术与金

融创新

封二 向阳的概念艺术作品

主编 张立升 执行主编 王 焱

执行主编助理 王 萍

责任编辑 马 洁

封面设计 蔡立国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sd-book.com.cn>

社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编辑部电话 (0531) 82098006

E-mail: chazuo_shehui@hotmail.com

majie0720@126.com

发行部电话 (0531) 82098021

邮发代号 24-19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学家茶座.第39辑/张立升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4

ISBN 978-7-209-05716-5

I.社... II.张... III.社会学—文集 IV.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2256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16开本(172×232毫米) 10印张 160千字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14.00元

自我为什么是深渊？

高 政

“自我是一个深渊”，这句话出自刘瑜发表在《新周刊》上的一篇文章。原文摘录如下：

如果说《兔子快跑》展示了一个关于爱情的道理的话，它就是：一个人是多么容易把对自己的鄙视误解为对爱情的需要。兔子先生厌恶自己的平庸空洞，于是他不断制造爱的泡沫。爱情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可以遮蔽一个人存在的虚空，爱情的渺小之处在于它只能遮蔽这个虚空而已。对于解决自我的渺小感，爱情只是伪币。

说到底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太难，改变别人更难，剩下的容易改变的只是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在一起，分手，和好，再分手，第三者，第四者……啊，枝繁叶茂的爱情，让一个可忽略可被替代可被抹去而不被察觉的存在，看上去几乎像是生活。

我看到的只是，自我是一个深渊，它如此庞大，爱情不可填补。

看完之后我的第一感受，终于明白了那么多哲学家为什么不愿意要爱情了。他们可以有性（康德与女仆），可以有生活伴侣（萨特与波伏娃），只是不需要爱情。因为他们的自我已经强大到不需要这点荷尔蒙来填满了。他们毕生以思考为乐趣，以解决人类思想史上的难题为己任，以反思和推进人类的生存状态为目标。可能，在今天看来，有些哲学家自以为成功的思想成果未必是真的成功。但，至少，他们自己会感觉幸福而圆满的。有一件自己喜欢又毕生追求的事情是多么的美好，如果碰巧解决了，就像牛顿谦虚地说他在海边捡到几个贝壳一样，真是要感谢上帝了！今天，有一件自己喜欢又毕生追求的事情，几乎成为大多数人的奢望。犬儒式的生存可能是这个压抑的制度环境所有人的生存

高 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

策略。

我第二个感受就是明白了梁静茹的那首很温暖的《瘦瘦的》：“我的心，现在瘦瘦的，一下子，就饱了。”我曾经搞不明白为什么会用“饱”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心”呢？现在明白是因为自我的深渊已经被爱情塞满了，不需要其他东西来填了，内心已经被爱情占领了。所以，不想追求其他的了。所以，饱了。更神奇的是，在英语里“饱（be fed up）”居然还有厌倦了的意思，刚刚饱了，马上开始厌倦自己吞下去的那些食物，甚至开始厌倦自己的吞咽需求和行为。看来深渊未必是被填满了，填满深渊的东西可能成为下一个无形的深渊，有形的可以捉摸的深渊可以填满，无形的却可能永远填不满。

说了这么多深渊，为什么会有深渊呢？为什么会有自我的深渊呢？

我曾经很认真地反问过自己，我真的喜欢什么？我到底想追求什么？这种不断的追问让我间歇性的很痛苦，直到现在，我依然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追求什么。但是，这种痛苦的思考让我开始渐渐接触到另外一个问题：自我到底是什么？弗洛伊德说，本我和超我的结合就是自我，自我是原始欲望和伦理规范的现实统一。其实，我看自我还可以继续分下去，至少在中国的社会文化里，自我可以分为天性的自我与社会建构的自我。我们会天生地具有一些性格、气质，具有一些兴趣、爱好，这些东西，可能是永远无法被改变的（当然，布迪厄会抬杠说这个自我其实也是与阶级出身和童年期所处的阶层文化有关的），这个就是天性的自我。如果我们真的按照天性自我的爱好去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么就像哲学家一样，会具有非常强大的自我，强大到美好的爱情都不需要了。问题是，社会建构的自我可能比天性的自我更强大。一个社会强大的文化规范和无所不在的价值观，无时无刻不在塑造完美社会的自我。尤其在中国的文化里，大家都是被一个单调得出奇的价值观念塑造成无数个——尽管天性的自我千差万别而社会构建的自我却是出奇地相似的——人。我们的社会自我要求我们要出人头地，我们要有“出息”，我们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们要“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们要“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们要挤进所谓的“体制内”，我们要选择社会地位高收入好的职业，我们要这个，我们要那个。13亿中国人的社会构建的自我最后只有这些共同的追求了。但是，每个人天性的自我肯定是千差万别的。因为这个，其实每个人都无时无刻不活在自我的分裂之中。

难怪奥运会的时候,我们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估计信奉自由主义的人士,死都看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说这是心理学上的从众心理在作怪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众”实在是太大了,我们“从”的人也实在太多了。我们几乎很少有时间,很少有机会,也很少有意识停下来问问自己的天性自我到底喜欢什么,到底想做什么。而不是什么社会构建的自我认为是好的,我就要拼了命地去做。

其实,我们的“自我”处在一个很微妙的状态下,因为天性的自我与社会构建的自我未必和谐,我们会经常感觉自己没有存在感,没有意义感,没有这个感,没有那个感,直到最后被折磨得没有感觉。我们试图通过这个通过那个来证明卑微的自己似乎不是那么卑微,无聊的自己似乎不是那么无聊。这种证明或许只能是暂时的解脱,就像兔子跑了一辈子,依然在跑。我们考上大学考硕士,考上硕士再读博士,很少能静下来问问自己:我到底喜欢做学术吗?我喜欢研究吗?我是韦伯所谓的以学术为天职的人吗?更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一种盲目的从众。

我们来看一个天性的自我貌似比社会构建的自我更强大的例子。英国大学教师的平均工资(课题科研经费和稿费收入除外)普遍低于中学教师的平均工资,而中学教师的又低于厨师的,厨师的又低于技术含量很少的体力劳动者的。当然,最终税后,不管你做什么,貌似得到的都差不多。这里的人做什么工作,更多考虑的不是哪个收入好,哪个地位高,而是自己喜欢做什么。我认识一位教师,本来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哲学博士、金斯顿大学(陈奕迅的母校)的讲师,因为讨厌大学官僚体制的文化和缺乏思想活力的大学生,故而辞职到当地的一所中学任教。因为喜欢,可以把工作作为一种享受;因为喜欢,工作可以成为生命和生活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也许是中华民族太卑微,也许是我们这个民族经历的苦难太多,我们总是苦苦追寻出人头地,好像唯此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当然,在我们的文化逻辑里,幸福或不幸福很多时候并不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而是根据周围的人怎样评价自己。当周围的人都羡慕你的成功、你的“出人头地”时,就算你过得再艰辛,也会飘飘然地感觉自己很幸福。不仅是幸福,连我们成功与否的标准都不是出自自己的目标设定,而是他者的评价。甚至连我们道德的标准,也是出

自他者的评价,而非内在的良心律令。我们可以制造假奶粉、毒大米,只要不卖给亲戚朋友同事,卖给无关紧要的陌生人,就不是不道德,我们也就可以心安理得。中国的食品造假已经到了这等地步,却可能会有更多的假、毒食品涌现出来。这样一种道德心理的机制使我们心安理得地制造了太多的假冒伪劣。据说在泰国,因为流通着太多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制造的假冒伪劣商品,连自己的性别也“假的不能再假”的人妖,居然不肯接受中国的人民币。

哲学家的故事和梁静茹的情歌在自我这个问题上实现了高度的统一的认识。让人感觉好像最抽象的哲学与最现实的生活可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毕竟哲学家也是人,毕竟哲学永远是关注最当先的时代问题的。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许我们可以套用一下,一切真正的哲学都是当代的哲学。

或许那些故意把哲学理论搞成高深莫测文字游戏的人,用一个很潮的词来说就是 *zhuangbility* (汉语拼音加英语后缀的中西合璧读法)。为了显示自己高人一等,为了显示自己智力的优越,为了显示自己的水准,总是有学者试图把自卑的深渊用看起来玄乎其玄的理论来塞满,把本来为了解释和理解现实问题的分析框架搞得支离破碎。读硕士时我曾经选过一门课,上课之前我还大概知道这个学科是干什么的,主题、理论流派、研究范式等等还是知道一点的,可惜等到这位高深莫测的教授上完课之后,我已经完全不知道这个学科到底是干什么的了,脑子里一团糨糊。我向教授表达了自己的困惑,没有料到教授很高兴地告诉我,你被解放了,你已经彻底脱离了原来的理论思维的桎梏,一瞬间让我感到自己窒息得要晕倒。在我做助教的教育硕士的课堂上,一位学生语重心长地跟我说,那些老师把本来自己明白的很多东西彻底讲得不明白了,他甚至说,“求求你们这些所谓的搞理论的,能不能别再继续忽悠了”。那些很学术、很专业、很抽象、很晦涩的概念和名词除了给学者之间在学术交流时带来一些便利外,对于理论的真正传播与影响,估计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好处。我在看一本评述法国社会理论家布迪厄的书时,上面有句话差点让我抽过去了,“布迪厄通过创造新的概念来解决理论难题”。当然,理论难题在他那里是被解决了,只是给读者带来了新的难题,一个完全有着全新内涵的概念,比起那些以前存在的理论难题来可能好不到哪去。我们不排除有真正的纯理论的哲学研究或者元理论的研究,但是这些理论在整个理论的总量里,可能只是很小很小



的一部分。看看中国每年国家科研基金中标的科研项目名称,大部分欧美学者估计要被吓死,他们一辈子研究的问题都不及中国学者一年研究的多。哈贝马斯说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这一点在中国现在的学术界体现得太明显了,科研课题、学位论文、开设课程几乎都是一些假大空理论名词的大集合,索卡尔事件在中国 24 小时全天候地上演着。其实,大部分理论研究应该并且必须是实践指向的,没有实践感的理论,用一句很恶俗的话来概括就是,“全 TMD 扯淡”(又一个中西合璧)。

当然,zhuangbility 绝非仅仅是学术圈,在世俗的生活领域,我们都苦苦挣扎着去追求向上的社会流动,但是等到真的经历了无数磨难成功跻身于社会上层之后,我看到的更多的却是一种无比的自我优越感与对下层的鄙视感。就好比鲁迅“国人心灵不医治的话,肉体也不值得救治”这样的言论,完全是挑战文明社会的基本底线,违背了人权的基本常识,难道有的人卑贱和愚昧得连肉体都不值得医治了吗?鲁迅继承了儒家传统社会知识分子对于普罗大众的道德和智慧优越感。鲁迅说中国文化吃人,乃是真知。可惜,鲁迅自己并没有能跳出这样的文化。相比于特雷莎修女式的行动家,鲁迅缺少对平民的博爱精神和对未来乐观的积极追求。和鲁迅这样被造出来的神相比,社会中更多的是无法跻身上层的人们,因为社会构建的自我的单调性与天性自我无限丰富之间的矛盾,我们的自我深渊是何其无底,除了自欺欺人地自我安慰,自欺欺人地在他人面前表演以获得一点点可怜的尊严与自我认同以外,其他的什么都做不了。我想到了江淮地区的一句俗语:“满瓶不响,半瓶晃荡”(这其实是一个很伟大的隐喻,自我的深渊和瓶子的内部,填不满的空间是共同的主题)。我们到处炫耀和夸大宣传自己的所有的那点可怜的东西——金钱、信息、知识、财富、权力、关系,唯独没有我们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的存在对这个世界的意义。

其实,QQ 签名、空间和网络论坛、博客在很大程度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全地球貌似只有中国人才会有如此强烈的表达欲望,表面上看起来是表达,其实更多是用虚假的繁荣和想象的强大来填满自卑和迷茫的自我深渊(同样适用我自己)。当然,现实生活中我们那么卑微地生活着,在虚拟世界中塑造一个强大一点的自我,也没什么不好。当然,在大部分时候我们很艰辛地生存着,在他人面前塑造另一个完美的自我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于是,我们身边总会有些人

习惯性地有着无比的自我优越感,哪怕自己什么都没有,其实也正是因为什么都没有,甚至会觉得连自己呼吸的空气也比别人要清新一些。心理平衡在中华大地上实际成为每个人世俗生活的主题。其实,有时候我们除了自欺欺人的阿Q一下之外,其他的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在社会优势阶层面前,弱势阶层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这就是现在这么多人在暴力和强权面前,只能选择自焚或者跳楼来表示抗议与不满的原因。

但是,这种自欺欺人式的平衡与满足,说到底,仍是一种虚幻。

说到底,建立在社会自我而非天性自我基础之上的一切努力与追求,对追求者来说都是一种挣扎与痛苦。只有找到天性的自我,在实现这个真实自我的道路上,我们才会是永远幸福快乐的,即使我们没有达到目标。

俞敏洪说:高学历其实是没有能力的人自我证明的一种方式,难怪盖茨连本科都不需要毕业了。也许这是儒家文化重视学历的最深层次的社会动因。我们在苦苦追求并不是天性自我真正想要的,而只是为了填满社会自我的深渊的那种他者肯定和羡慕的所谓幸福生活。这个过程,是不可能幸福的。这种结果,不知道会不会幸福,因为全世界只有一个梦想,实现起来就难免要挤得头破血流了。

这种建立在他者评价之上的自我认同,永远不可能填满自我的深渊。毕竟,他者是你的地狱,不是可以救赎你的上帝。



“后商君时代”的法家文艺

廖 奕

中国文艺那些事儿，除了狗仔队关注的绯闻、隐私、凶杀、毒品，上点层次的就是什么咖啡大蒜之争，没料到，“周咖啡”、“郭大蒜”最近都很烦，我们也别再去烦他们啦。此文要讲的可是中国文艺界的绝对大腕，地球人都知道的大导演——张艺谋。其实，严格说来，也不是专门说他，只是以其“艺术”为噱头，谈谈当下中国一种另类的社会抗争逻辑。

君不见，大众思想的主要引领者，差不多就是这些新时代的“法家文艺工作者”了。他们在体制内外游刃有余，深得各方宠爱。老谋子的《秋菊打官司》被誉为法律社会学的活教材，确实拍得到位，我看了几十遍都觉得意犹未尽。秋菊，一位找寻说法的农村妇女，正是社会抗争的典型，然而，法律最后带给她的“正义”却令其无比困惑与尴尬。不过，实话实说，张艺谋之后的电影很难让我再有评论的冲动。

但这次，在“号称史上最干净的爱情电影”——《山楂树之恋》面前，我败下阵来。看到“老三”为静秋包扎伤脚，我眼角潮湿。但看了文艺批评家王晓渔的文章，我在感动之余还获知了“法家文艺”的诸多信息。

晓渔的大作，名为《“清纯”的政治学》。他开篇明义：“为什么张艺谋既热爱帝国和君主，又热爱清纯的民女，《商君书》早已给出答案。‘清纯’，是一种政治学。”在他看来，“山楂树之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那个年代的男女关系，不仅不怎么干净，还有些下流，王晓波笔下的“王二”就是典型一例。习惯歌颂完美暴君的张艺谋，如何又寻找起清纯民女，这不是精神分裂吗？原来，答案都在“骨灰级”法家大佬商鞅的思想中。

《商君书》有云：“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强则越志；

廖 奕：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珞珈青年学者”。

轨则有用，越志则乱”。翻译为白话就是：国家的王道在于让民众服从。民风纯朴就会循规蹈矩，服从命令听指挥；民风淫荡就会有奇思怪想，破坏稳定团结的局面。作为著名的“秦粉”，张艺谋鲜明的法家文艺风格，让人不得不怀疑他也是商鞅的忠实粉丝。于是，一部寻找清纯爱情的奇特法家电影诞生了，以至于原著作者艾米成为坚定的异议者，她在博客上对张艺谋的改编作出了激烈的反应。作为艾米的呼应者，晓渔透析了清纯背后的“法家政治学”，对以张大导演为代表的“法家文艺”进行了有力的“揭批”。但，我们仍须追问：法家难道真的是那么刻薄寡恩、无理禁欲吗？

拙见以为，人民生活的普遍放荡或者过度禁欲，其实都不是统治集团乐见的。“文革”时代批儒弘法，对性的公开压抑和私密放纵，本质上是“运动政治”的非常表现，也是“权力技术”的正常彰显。在任何时代，如果没有“装纯”的意识形态，严密的社会控制，男欢女爱的乐趣就难以因稀缺、隐秘而倍显珍贵，就难以生发无尽的回望和眷恋。只不过，革命时代的爱情和欲望，通过法家的权力技术得到了奇异的柏拉图式升华——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怪的反讽！晓渔看到了法家的政治野心，却忽略了法家的情感倾向。尽管“王二”滔滔者天下皆是，但我们却不能因此排除清纯者的偶存。

清纯并不是愚昧，相反，它代表了一种未受权力熏染的天然洁净。《山楂树之恋》中，长相清纯的女主角，一开始就屈从于权力的安排和秩序逻辑，对激烈的爱意不断按捺，甚至残杀，最终，她的情感冲破了权力的牢笼，跳出了秩序的圈套，勇敢地迎接将死的爱人。最后的哭戏，悲剧式的收尾，女主角的出国，一切的一切，都反映了“法家文艺”另类的抗争逻辑。

这种逻辑有着柔软的表皮。在总体的悲情氛围中，观众有很多开心一笑的机会。静秋对性知识全然无知，竟然以为男女只要同床而卧就会怀孕！大家之所以觉得好笑，根源于现时代的“开放”——既有知识信息的开放，更是生活方式的开放。过来人回忆说，那时有一对青年男女相爱很久了，一天两人在村外见面交谈，男的忍不住在女的脸上亲了一口，那女的起身就跑回家，关起门大哭起来。她的母亲叫开门后问出了什么事，女的竟说：“他亲我了，我怀孕了。”

据此，有人会说，这不就是法家的愚民吗！回到那个时代，太可怕了！我们还是愿意生活在当下！尽管世风日下，却也自由自在。不错，我们回不到过去，也不



愿开倒车、走老路。问题在于，“愚民”真的存在吗？上愚下，还是下自愚？貌似愚直的民众充满反抗和规避的狡黠和技能，静秋和老三都是那个时代的叛逆者。

在当时，静秋并不清纯。她已经够大胆了，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被劳动管制，自己还是一个学生，就敢偷偷地与老三谈恋爱。他们不但经常幽会，搂搂抱抱，还一块下水洗澡，最后竟跑到一张床上去了。老三也不革命。他总是有意无意地对静秋进行思想的启蒙。他如同一个未卜先知的神秘祭司，不断对一个蒙昧的少女传道布教。如果老三不死，或者老三晚些死，他一定会把静秋培育为“改革开放的新一代”。静秋，用她的身体进行秩序的颠覆；老三，则是用他的思想进行灵魂的洗礼。勾连二者的，正是自然的情欲，肉体的吸引。制度化的压抑非但没有斩断藕丝，却极大强化了情欲抗争的力量。

后商鞅时代的“法家”也学会了“纵欲”，对于百姓，不再苛求。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不像商鞅那么单纯，提出了“明主治吏不治民”的圆滑手腕，奠定了“儒法合流”的思想基础。如果说，张艺谋是法家文艺的代表，他更像老练的韩非。一方面，强调时代的大背景不可更易，社会的总秩序无法改变；另一方面，突出个体的逆反和最后的悲剧。权力逻辑的无坚不摧，由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也许是历史上的商鞅太过坚硬，在2009年热播的《大秦帝国》中，片中的商君与白雪，一个美丽的女子，上演了一场温柔至死、荡气回肠的爱情戏。商鞅赴秦，离别之际说：“我愿与你泛舟湖海，与范蠡西施一般，永不涉政事。”白雪悠然一叹：“君有此言，白雪足矣。君之内性，强毅刚烈，疾恶如仇，初入秦国，万莫以官场瑕疵萌生退意。”商君变法中途受挫，想打理行囊，与白雪远走天涯。可在白雪心中，没有商鞅，秦国变法将半途而废。没有了变法，商鞅也将不再是商鞅。“我去也，君自保重。”白雪走了，带着未出世的孩子和对商鞅生死不渝的爱情。事情被倒转过来，似乎不是法家无人情，反倒是人间不容法家！

相比于这样的法家文艺标本，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的确算得上另类。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绝望的悲情，隐忍的抗争，和那尚未断绝的人性启蒙。法家张艺谋，一面是斡旋于政治和商业的世故圆润，一面是纠结于青春和初恋的天真幻想——这是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写照，绝非老谋子的个人写真！在情欲抗争的社会语境中，我们都是亲历的见证者、痛苦的反思者，在不断透支时代红利的同时，适时追缴心灵的亏欠。

底层群体的失语与发声

苏熠慧

一曲《春天里》将“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捧红了大江南北。从2010年9月开始,他们在网络上的视频被疯狂转载,许多网友都纷纷加入“钢镚”的行列,成为他们的忠实粉丝。仅一个月后,他们便登上了浙江卫视的舞台,并在11月6日的央视三套《星光大道》上获得了周冠军,更在网友的支持下参加了春节联欢晚会的表演。虽然,他们的“农民工”身份曾遭到一些媒体的质疑,并卷入与原唱汪峰的“版权纠纷”,但这些都丝毫不影响网友追捧他们的热情。到底是什么样的魔力让如此多的网友成为“旭日阳刚”的忠实歌迷?一个网友的留言里这么写着:“感动得泪流满面,真正打动人心的音乐,二位兄弟的歌声唱出了底层大众的心声……”实际上,“旭日阳刚”组合的演唱技术是否该得到肯定,他们是真正的“农民工”代表,还是背后有着商业炒作阴谋的“流浪歌手”,这些问题本身已变得不那么重要。“旭日阳刚”现象让我们看到的,是底层群体的集体失语和他们对发声的强烈渴望。

在布迪厄的研究中,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同样都是社会结构在个体身上的体现,它通过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不同位置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不断地再生着社会的结构。文化资本也是一种权力。一个人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是由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所决定的,体现着他在这个社会结构中所拥有的权力。对于底层群体来说,由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底层的位置,他们所拥有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比其他群体都少。一个出生于农村农民家庭的孩子,最后获得的教育程度往往比城市中产阶级的孩子低。这可能因为农民家庭不如城市中产阶级有钱,或是因为农村家庭的社会关系少,不能将孩子送入那些城市中的好学校,更可能因为农村的教育环境(如小学和中学的教





一曲《春天里》将
“农民工”组合
“旭日阳刚”捧红
了大江南北。

育质量)差,使得农民的孩子难以拥有城市中产阶级孩子那样的知识基础。这些由文化资本分配不均匀导致的现象,往往被归为个人能力的结果。“人们不承认文化资本是一种资本,而是承认它是一种合法的能力。”(布迪厄语)对于那些考不上大学的农村孩子,人们常常认为他们“笨”和“学习能力差”,却从不思考背后的结构原因。

文化资本分配不平等的结果之一,是社会精英阶层掌握话语权,而底层群体则被剥夺话语权。底层群体,常常因为他们的“教育能力低”、“写作能力差”而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他们的故事由精英阶层代为编写,甚至被遗忘在主流叙事之后。看看文化市场里充斥的各种迎合中产阶级和精英基层品味的文化产品,不管是电视还是网络里,人们总是无休止地讲述着消费、美容和休闲娱乐等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中心的话题。在这些“高雅”和“有品味”的精英文化被人们争相追捧的同时,底层文化却被认为是“粗俗”和“低劣”而遭到贬低。“阳春白雪”余音缭绕,“下里巴人”消失匿迹。底层群体每天在电视和网络里接触到的,总是离自己过于遥远的花花世界。他们无法,也没有途径展现自己的生活,表达自己的心声,只能隔着屏幕去接受那些不属于自己的故事,有时候偶尔想象一下那个繁华世界,却马上被拖回残酷的现实。他们在那个世界里的形象,往往是愚昧和滑稽的。大众传媒,成为精英阶层的眼镜,将底层群体的形象,过滤成一群“黑漆漆脏兮兮”,“没有文化”,“举止粗野”,甚至“危险”的“农民工”。然而,对底层群体来说,“农民工”是一个标签,是精英群体创造出来用以划分“我

群”和“他者”的社会分类。它只是与歧视和侮辱紧紧相连的符号。如果底层群体能够书写自己的故事，“打工者”将成为他们自己的代名词。“黑漆漆脏兮兮”会作为长期在烈日下劳动的证明，而与“勤劳”被共同歌颂；“没有文化”会成为控制文化资本不平衡的证据；“举止粗野”和“危险”则会因为它们的歧视色彩而消失。但这一切都随着底层群体话语权被剥夺，而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旭日阳刚”的出现，将这个遥不可及的梦变成现实。视频里简陋的住房和杂乱的酒瓶，丝毫不影响其歌声的感染力，反因它们的真实而为歌曲增添了几分无奈。裸露的上身也摆脱了“粗野”的色彩，因体力劳动而强健的肌肉，与时下流行文化中崇尚的“伪娘”形成鲜明对比，成为“阳刚”和“爷们”的代表，并与他们嘶哑沧桑的嗓音交相辉映。“没有信用卡也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虽然我只有对爱的幻想，在清晨在夜晚在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这些充满辛酸的歌词唱出了所有挣扎在生活边缘的人们的心声。在网友的反馈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是如何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边界，将歌词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的：“想起了刚毕业那会儿，找工作的路上，一分钱没有了，拣起路边别人扔的半瓶矿泉水喝。（优酷网友语）”“感动得泪流满面，真正打动人心的音乐，二位兄弟的歌声唱出了底层大众的心声。回想当年在青海，老婆千里来看我，而我手里只有1元钱，舍不得坐公交车，走了几里路去车站。那时为了省钱，在天黑菜市场快关门的时候，去买大堆的最便宜的菜。”（优酷网友语）如果说“西单女孩”任月丽让人们看到艰苦环境中永不磨灭的希望和清澈的心灵，那么“旭日阳刚”的《春天里》则唤起了底层人们对真实生活的共鸣，以及表达这种真实生活的渴望。

“旭日阳刚”之所以能够走红，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歌唱技术多么高超，而是因为



西单女孩任月丽

他们的视频真实表现了底层群体的生活。“这个总比本山大叔那种损害农民形象的伪农民来得纯粹多了……”(优酷网友语)比起精英阶层所垄断的主流文化中那些歪曲和丑陋的底层形象,这样的形象更能得到底层群体的认同。而失语已久的低层群体,正是借用网络的力量,向整个社会发出自己声音。“看多了太多所谓明星的肮脏,糜烂,做作,藐视底层,炒作,唱着不食人间烟火、自我感觉良好的歌。这首歌虽然翻唱……但朴实,真实,激昂。……那是我们老百姓最底层的声音!”(优酷网友语)追捧“旭日阳刚”,不仅是底层群体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实现,也是他们对精英文化作出的挑战,以及对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进行的反抗。通过建立“旭日阳刚吧”和“旭日阳刚非官方网站”等追星行为,底层群体颠覆精英阶层为他们抒写的剧本,着手建构自己的叙事方式。

改革开放以前,社会阶层的边界较为模糊,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大众文化的主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阶层的边界也越来越明晰。文化逐渐成为一种资本,并通过教育这种制度形式,帮助精英阶层完成对话语权的垄断。“旭日阳刚”的走红,正是在社会结构里挣扎的底层群体,为改变这种文化资本运作逻辑而作出的一种努力。他们虽然没有办法通过改变文化资本的分配来颠覆精英阶层对话语权的垄断,却可以通过追捧自己的偶像来挑战主流文化中的精英叙事。“旭日阳刚”是否“真正的农民工”,对底层群体来说已不重要,因为它已成为底层文化的符号,被底层群体用来向全社会证明自己的价值和存在。